



神
学
丛
书

神学思想发展史

神 学 丛 书

神学思想发展史

信理部分之二

佘山修院改编

(修订版)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2000年5月

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 金鲁贤 准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神学思想发展史

光启神学丛书

信理部分之二

佘山修院改编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出版、发行

2000年5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5000册

上海市重庆南270号

邮政编码200025

天主教上海教区印刷部承印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南街76号乙

· 版权所有 · 请勿翻印 ·

出版前言

光启《神学丛书》系由一批神学教育工作者根据多年教学实践集体编写的一部神学讲义,篇幅浩瀚,内容丰富。现由天主教上海佘山修院进行分类整理、删节改写,分册陆续出版,以满足目前我国修院的教学需要。

《神学思想发展史》是整部光启《神学丛书》系列中《信理神学》部分的一分册。

神学思想发展史

目录

第一章	神学的意义与来源	1
第二章	初期基督宗教的神学反省	6
第三章	第二、三世纪的神学思想	11
第四章	第四、五世纪的神学(东方教父)	16
第五章	第四、五世纪的神学(西方教父)	22
第六章	从教父到经院神学、即第七、八到十二世纪的神学	28
第七章	经院神学的黄金时代	34
第八章	经院神学的衰微	40
第九章	宗教改革与宗教改革氛围下的神学发展	45
第十章	启蒙时期与理性主义下的神学思想	50
第十一章	现代主义的危机与神学新气象	56
第十二章	二十世纪神学的新趋势	61
第十三章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与未来	67

第一章

神学的意义与来源

讲了神学导论之后,从这一章开始,要讲神学思想发展史。现在先看看,神学的意义与来源。我们要从三点来探讨:

从“希腊与罗马世界中的神学观” 看神学的意义与来源

就像教会很多的用字,是从希腊文来的,“神学”这个字,也是从希腊文来的。在古代的希腊文化里,“神”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古代的人,对于世界许许多多的事物都不了解,为了方便解释这些事物,于是便有了“神”这个字。既然,神是为了解释世间形形色色的事物而产生的,那么“神学家”这个词,指的就是思索世界来源的人。神学家们把神明是怎么来的,建立了详细的系统,他们为了解释世界上的事物,写下了许多的神话。

希腊文化里的神,是人想象出来的,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而生产的。事实上,希腊人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他们的想象力又极为丰富。因此他们心目中的神,也就包罗万象,山川草木都是神,所以在希腊神话里,充满了仙女、妖精、山神、半神半马等精灵鬼怪的故事,这些神不但有广大无边的神力 and 法力,同时也有和人类相同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

后来神学的发展,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著作《论共和》这本书里,曾经使用“神学”这个名词,但柏拉图所说的

“神学”，是指着神话中所隐含的深奥的教育价值。到了亚里斯多德的时候，他把“神学”这个名词，引用到哲学上面。亚里斯多德认为哲学有三种，就是数学、物理和神学。其中神学是研究宇宙根源的学问，是“第一个哲学”。

在探讨宇宙根源的时候，亚里斯多德认为整个宇宙所有的事物都会转变，这种转变肯定是起源于一个不动的原动者，这位不动的原动者就是神。由此可见，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神学”，就是用神来解释宇宙的现象，神是宇宙的根源。这种看法就是后来一般学术界通称的形上学，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考、反省。可是，因为这种神学是探究宇宙根源的问题，所以称之为第一个哲学。

到了公元前第二世纪，有一个学派叫斯多噶学派(Stoicism)。此学派是希腊哲学的一派，公元前四世纪，由一位名叫芝诺(Zeno)的人创始的，这学派主张禁欲主义，认为个人的生活是基于严格的自律和理性而发展出来的独立个体。这个学派把神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神话性的神学；所谓神话性的神学，是用神话中的神道来说明、解释诗和文学；第二类是自然性的神学，自然性的神学是用神来解释宇宙、大自然的现象。这一类的神学有一个倾向，就是把自然界的力量拟人化而成为神。第三类是政治性的神学，政治性的神学所研究的是希腊、罗马各大城市中，公开的礼仪和社会政治的关系。

从上面描写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希腊罗马文化中，“神学”这个名词和今天所谓的哲学更接近，和我们所谓的神学大不相同。

“神学”在教会中的意义

教会一开始，就有神学的现象。可是，因为“神学”这个字是希腊哲学中，所使用的字，而且还牵涉到神话，所以教父们很少使用“神学”这个字；必须用的时候，还是遗留一些希腊

文化的痕迹。后来，慢慢地，教父们使“神学”这个字，脱离了古代希腊文化的含意，而给神学新的意义，也就是教会性的意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教父和教会的神学家，使用“神学”这个字的时候，所表达的是哪些涵意。首先，要看的是希腊教父，然后是拉丁教父。

希腊教父就是在亚细亚希腊文化地区的教父，因为他们使用希腊文写作、讲道，所以，称为希腊教父。由于拉丁教父住在意大利、罗马拉丁文化地区，他们用拉丁文写作、讲道，所以被称为拉丁教父。

希腊教父

我们举几位希腊教父的看法。首先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克来孟，克来孟认为神学是指有关神的知识。其次是奥立振(Origenes)，他认为神学是有关天主的真实道理，是基督信徒对天主的一般知识。还有 Eusebius 教父，他认为神学是有关真天主和基督的学问。此外，Denis 教父，他认为神学家，是指圣经和获得启示灵感的作者，神学则指对天主奥迹的领悟和体会。到第四世纪后，一些希腊教父认为神学是指有关天主圣三的真实道理。最后，一些神秘学家认为，神学是指灵修的知识，是灵魂在圣神光照下，对天主更深入的认识。以上所说的，是希腊教父使用“神学”这个字的时候所表达的涵意。

拉丁教父

拉丁教父，包括奥斯定在内，一直都没有为神学这个字，给予教会性的意义。虽然奥斯定也引用神学这个字，可是，他把神学分成真神学和假神学，真神学引导人走向基督信仰，假神学只是对世界的事物说明和解释而已。由此可见，对奥斯定

来说,神学只是一种哲学而已。

从上面的介绍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教父时代神学是宗教活动之一,具体来说,神学是指认识天主,而且,这种情形一直到十三世纪才有了转变。

教会的神学家

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哲学家亚培拉把神学跟“基督宗教的道理”、“神圣的学问”放在一起,三种意义相通,可是,对于“神学”这个字,用得还是很少。十一世纪以后,隐修士的传统认为祈祷、灵修等神圣性的活动和学问,都可以称为神学活动。十三世纪的时候,教会学者对“神学”的运用,发生了转变。

起初,教会学者比较常用“神圣的学问”、“神圣的道理”以及“基督宗教的道理”这类名词,而很少用“神学”这个字,包括多玛斯在内,都是这样。虽然多玛斯常用“神圣的道理”这个名词,来表示教会的道理,以及对传统和教会训导的系统解释。而很少使用“神学”这个字。但是,在多玛斯的用法里,神学有两种涵意:第一种是根据神学这个字的字源,认为神学就是论天主的知识;第二种涵意是研究天主启示的学问。第二种用法跟今天对神学的解释比较相近。

从十三世纪开始神学成为一门学科,因为十三世纪的欧洲,各大学纷纷兴起,产生了科目的区别,多玛斯认为神学也是一门学科。此后,神学不但成为一门学科,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比较确定。

因此,我们可以说,十三世纪是神学这个字的分界点。十三世纪以前,神学是宗教活动之一;十三世纪以后,神学是一门研究天主启示的学问,是许许多多学问中的一门学问。

神学的来源

教会中的神学是以天主救恩的启示为出发点。从天主的角度来说,神学是天主在创造工程和人类历史中的自我通传;自我通传就是天主把自己启示出来。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人在信仰中接受了启示。人对天主启示的接受和了解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存在性的,比方说,一个人相信天主是存在的;第二种是直觉性的,也就是说,因着天主的神恩,人借直觉对信仰产生深入的了解;第三种是解释性的,就是在圣神的光照下,人借理性的思考、反省、观察等等的活动,来了解启示。

神学的来源和产生是为了解释信仰,接受天主的启示。在教会生活中,基于三种原因,我们必须对信仰加以解释。第一种原因是为了使教会本身更清楚地认识天主和耶稣基督;第二种原因是为了在各文化中表达信仰,使信仰获得传播;第三种原因是为了面对不信者。不论是上面哪一种原因,促使我们必须对信仰加以解释、反省。这一类解释性活动,就是神学的主要来源。

综合这些信仰的解释,可以看出神学的两种倾向:从消极方面来说,是为解除内在的矛盾,抵抗外在的反对力量。也就是说,对内必须排除错误的思想,强调正确的思想,从事统一的工作;对外必须保护信仰,从事护教的工作。从积极方面来说,为了使信仰系统化,神学必须从事组织、整理、建立系统的工作。就在这些信仰的解释性活动的努力下,神学的内容一天比一天更丰富。

第二章

初期基督宗教的神学反省

对“神学”这个学科的定义，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现在，我们再复习一遍，神学就是人类的理性在信仰的光照下，对天主启示的探讨。换句话说，神学是人在信仰中，用理智去了解把自己启示给人类的天主。因时代或其他因素的不同，探讨的角度也不一样，而且天主是自由的，所以，神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进展性的。

以天主的自由来说，天主是人类的主宰，祂在不同的时代里，用不同的方式来与人交往，这样，人可以愈来愈认识天主。从人类理性探讨的角度来说，虽然教会的信仰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信仰是从一开始，就在宗徒传承中保存下来的，可是，因为在不同时代、文化和不同的地区中，信友要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反省、思考能力和思考方式。这样，教会对天主启示的反省，有统一性，也有发展和不一致的地方。

天主的启示和人对启示的了解，都常常会有新的发现。人的理性在信仰的光照下，对启示奥迹的探讨具有进展性。于是，便构成了神学历史。

神学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教父时代、中古时代、近代以及当代。下面我们会详细介绍每一个阶段的时代背景、神学背景、神学的重要问题以及演变。

时代背景

我们都知道,初期教父时代,教会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生活的。当时的罗马帝国,可说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交通便利。而且,犹太教在帝国的统治下,享有一些特权,基督宗教靠着犹太教也得到一些特权,再加上犹太教到处有组织、有会堂,这种情形对基督宗教的传扬,以及教会生活来说,是很有利的。

初期基督宗教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以及犹太教的组织下得到发展,为什么后来有教难的发生呢?

虽然当时的罗马帝国,国泰民安,但是,人民的道德生活低落。尤其是第二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天灾人祸,皇帝不是世袭,而是军人当政,战争不断地发生,生活荒淫,伦理生活愈来愈低,造成人民对宗教的追求,所以,由巴勒斯坦传过来的,注重伦理道德生活的基督宗教,便受到了注意。

在这样的背景中,教会开始有教难的发生。不过,这时候的教难并不是普遍性的,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发生,而是地方性的,间歇性的。教难的发生,这要看教会和地方人士相处的情形而定,如果地方人士和教会相处得很融洽,教难就比较少;假如地方人士和教会交恶,教难就比较多。由于教难中有人背教,所以,也引起重新领洗问题的争论。虽然当时教会遭遇教难,可是,因为教难是地方性、间歇性的,所以,教会仍然能够继续传教。

当时教会已经发展到亚细亚、意大利、非洲、高卢和西班牙等地。在这些地方的大城市里,建立了教会。而且,还具备相当的组织。这些教会不只限于犹太人和奴隶的阶层,也打入了政治领导阶层中,甚至有些皇帝,清清楚楚地认识了基督宗教,在这种情形下,教会的神学活动,便有了可能性。

初期教父时代的神学背景

初期教父时代，教会面对犹太宗教和希腊罗马文化，她不断地探索自己的宗教信仰，来保护自己的信仰，所以，那时的教父被称为护教教父，又称为宗徒时代的教父。

由于当时的希腊，已经开始有哲学名词出现，比方说，位格、性体等，这些哲学名词影响了教父们对信仰词汇的运用。在思想方面，教会受到希腊哲学斯多噶学派和东方二元论的影响。斯多噶派主张禁欲主义，在个人的生活上，他们认为人要遵守自然律而生活，人最大的德性，就是不动情，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就不应该受情感的影响。此外，斯多噶学派很注意秩序，他们认为整个宇宙都应该有秩序，但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宇宙有目的、有秩序呢？他们认为全是出于 logos 的作用。

斯多噶派用的 logos，是希腊哲学所用的抽象原理，像中国先秦诸子所称的“道”，和若望福音中所用的 Logos 有不一样的意思，若望福音中的 logos，指的是天主的圣言。以形上学来说，logos 存在于万物之间，与整个宇宙的存在，不但分，反而互相混合在一起，也因为这个缘故，斯多噶学派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泛神论。

在解释宇宙的来源的问题上，东方二元论认为宇宙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自善，另一个是来自恶。一般来说，善和精神相连，恶和物质并列。同样的，人生也受善恶两种来源的影响，每一个人都具有善恶两面，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救赎。而所谓的原人就是标准的人，原人是带着救赎使命的人，原人要来救赎人类。所以，在东方二元论的神话里，也有原人的死亡和复活的记载。

东方二元论进入基督宗教世界后，产生了诺斯替派。诺斯替派主张天主有两个，一个是旧约恶的天主，另一个是新约善的天主，而耶稣基督所显示的、善的天主，最后获得胜利。耶稣

基督的救援是最大的得救，祂到世界上来，把真知传给宗徒，宗徒是最好的基督徒。宗徒们偷偷地把耶稣带来的真知传给别人。诺斯替派还认为教会有一些次等的基督徒，他们是靠领洗得救的。

当时教会对斯多噶派、东方二元论和诺斯替派，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初期教父时代，可以说是完全继承圣经的思想，还没有新的思想产生，对于“启示”这两个字，也还没有明确、单独地使用过，当然也还没有所谓的主客之分。也就是说，初期教父时代，对天主的启示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自然也就没有后来所说的，天主的启示是客体，接受启示的人是主体的区分。因此，他们觉得教会拥有足够的真理，因为教会有来自天主的启示，而且，教会外的知识对教父们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就算教会外有知识，那也是来自天主的启示，和教会有关系。

初期教父们的思想，在前面我们所讲的哲学背景中，肯定会产生冲突，也因为这个缘故，才导致基督徒对启示加以反省，于是便产生了神学。

这种神学是生活的神学，因为是由于生活中碰到了问题，不得不反省而产生的。当时著名的人物有罗马的克来孟，叙利亚安提约基雅的依纳爵、儒斯定、圣依肋内等几位教父。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四位教父，面对当时的思想文化，他们作了什么样的神学反省。

克来孟、依纳爵和儒斯定

克来孟是第四位罗马主教。在职九年，在位期间，经历了罗马道米先皇帝发起的教难。第一世纪末，他写了两封有名的《致格林多人信》，其中一封提到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他认为天主为教会建立了司铎制度，信友应该服从天主指派的神长。

除了克来孟是比较强调圣统的地位外，安提约基雅的依纳爵也有类似的思想。依纳爵是安提约基雅的第二任主教，在罗马斗兽场中殉道。他在往罗马致命的途中，写了七封信，信中充满热忱。这些信很有价值，内容包括许多有关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教会的生活和制度的宝贵资料，可以说是古代教会历史的入门。他也曾提出圣统制的问题。

至于儒斯定，传说他是犹太人，后皈依成基督信徒。他很喜欢哲学，先后加入过许多的学派。最后，儒斯定的主张是——基督的哲学是唯一可靠的和有益的。他最有名的著作是《与教外人交谈》。儒斯定认为梅瑟先知是有意义的，可是，犹太人已经失去梅瑟先知的精神，而梅瑟的先知精神，现今已存在于基督教会中。

依肋内

依肋内本来是东方人，后来到了法国，成为里昂的主教。他是宗徒时代最后的教父，也是第一位神学家，被称为“公教神学”之祖。他在深刻地研究各学派的学说之后，反对各种异端，尤其是极力反对诺斯替派。依肋内的基督论和现代的德日进神父的很相似，认为整个宇宙是准备基督的来临，基督要重整宇宙使之得救。基督是宇宙的开始和终结。

第三章

第二、三世纪的神学思想

在前面看了初期教父时代的神学反省，现在，我们要进到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看看那时候的神学思想。

第二、三世纪的教会，可以说是“地下教会”，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里，教会是不合法、受迫害的团体。可是，当教会面对教难的冲击的时候，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以及教会与救赎的关系；另一方面，就像前面两章所提到的，当时教会处在犹太宗教和希腊罗马文化的气氛里，教会也采用了异教文化，把这些文化基督化，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神学。

在第二、三世纪，教会所面对的重要神学问题，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护教问题

面对犹太宗教以及希腊罗马文化，教会必须向他们解说，耶稣就是默西亚。所以护教的重点是引用先知的的话，来肯定耶稣就是先知预言的默西亚。因此，教会向犹太人声明说：旧约时代的先知，就是为了准备默西亚的来临，而耶稣实现了旧约先知关于默西亚的预言。

教会对于希腊、罗马的外邦人的宗教态度比较严格，而对他们的文化和哲学，教会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对那些属于希腊传统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态度比较开放，因为教会认为基督宗教拥有一切的道，而希腊、罗马的文化和哲学，

是道的种子，根源也是道。

教会对于位于非洲，属于拉丁传统的迦太基学派的态度，就显得非常消极，认为他们的语言、哲学都是不可取的。虽然，教会对于属于希腊传统的学派，态度上比较开放，可是因为当时罗马人的伦理生活低落，因此，在护教上，教会很强调耶稣基督的伦理生活，即使是讲论耶稣基督的奇迹，也是从伦理生活着眼，来谈论耶稣基督行奇迹的伦理态度。

教会与救赎

教难的发生，使得教会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如教会与救赎的问题。当教会面对教难的威胁，和背教事件的时候，引起了一个争论，到底教会有没有权力赦免背教的信友呢？其中像蒙丹派、戴尔都良派和诺斯替等严格主义者，他们强调严格的伦理生活，所以，认为背教是不可以宽赦的大罪。对这个问题，教会认为一切的罪都可赦免。

重新领洗

严格主义者除了强调的伦理生活外，还自认为拥有圣神的临在，而反对教会正统的组织。当教会面对他们时，产生一连串的问题，比方说，他们的洗礼和圣事是不是有效的？他们中间有没有圣神的临在？如果有一天他们归正，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是不是需要重新领洗呢？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奥斯定时代，才得到解决。

基督论的问题

当时有两种思潮影响了基督论的问题，它们是犹太宗教思想和希腊思想。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一神论者，如果要他

们敬拜另一个神明，他们是宁死不屈的。相反的，希腊人是多神论者，在他们的思想中，有“半神”的观念，以为神是超越的，而半神是最高的受造物，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可是，半神和至高无上的神不一样。

对犹太人和希腊人来说，最困扰他们的是“耶稣基督是天主子”，纳匝肋人耶稣怎么可能同时是人又是天主呢？对这个问题，当时出现几种解释，比方说幻象论，爱喀沙论等不同的说法。

幻象论受到诺斯替派的影响，认为物质本身是恶，精神才是善的。因此，他们否认基督的人性，主张基督没有真的肉体，而完全是肉体的外观而已。跟幻象论持完全相反看法的是贫派。贫派否认基督的天主性，主张基督是一个人，和每个人一样，他虽然是先知所预言的默西亚，可是基督并不是天主子。

爱喀沙论否认基督的天主性，主张基督是一个完全的受造物，是一位先知。和爱喀沙论持类似看法的是西林瑟，西林瑟也否认基督的天主性，他主张“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真人，有肉体，是一位先知。而“基督”却是天主的能力，是天主与世界之间的中保，“基督”在受洗的时候，来到“耶稣”身上，然后，在受难之前，离开耶稣而去。关于耶稣基督是天主子的问题的争论，一直到第七世纪的时候，才完全结束。

圣三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常和基督论有关系。最初东方教会，也就是讲希腊话的教会，太强调天主是一体的，造成了天主只是一位的危险。另外还有一种论说，是“能力一位一体论”，他们把基督看作纯粹的人，生于圣母和圣神，在基督内，天主的能力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有所作为。还有一种叫“形式一位一体论”，主张唯一的天主，以不同的形式启示给人，有时在创造中是圣父，有时在救赎中是圣子，因此可以说，圣父成了人，在十字架上

受苦、死亡、复活。最后还有一种叫“夸大的形式一位一体论”，他们声称天主性有三种活动的形式：圣父是圣三的实践本质；而天主在救赎工程中，就是圣子；天主赋与圣宠，并圣化人灵便是圣神。面对天主三位一体的问题，教会到尼采和君士坦丁两届大公会议中，反对异端，肯定天主三位一体的信仰。

启示论的问题

在当时也有两种异端——

第一种是诺斯替派，前面一章我们曾提到过，他们主张有两个天主，旧约恶的天主，和新约善的天主。他们否认启示的连续性，否定旧约的启示，认为救恩史只是在新约中。

第二种异端是蒙丹派，蒙丹派把救恩史分成三段：旧约是父的阶段，后来是子的阶段，最后是圣神的阶段。蒙丹派的错误是在对启示的看法，他们并不承认耶稣来是启示的最后阶段，就是末世。蒙丹派反对教会正统，因为当时正统问题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从哪里找到正统的根据呢？从圣经可以找到，可是从哪些圣经呢？其次是继承问题。当时大家都接受天主教是宗徒继承人的说法，因此，非常注意“宗徒建立的教会”的说法。

当教会面对护教、教会生活与救赎、重新领洗、基督论、圣三论、启示论和正统等神学问题的时候，也作了神学上的反省。当时，影响整个教会，尤其是东方教会的有三个学派：就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迦太基学派以及正在形成的安提约基雅学派。这三大派对圣经的注解，和教会的态度有着不同的看法。

非洲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

因为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在注解圣经的时候，重视象

征和精神上的意义,作寓言性的注解。对于教外文化,这个学派态度比较开放,主张知识可经过净化进入信仰中,使人更深入信仰,而教外文化是道的种子。属于这个学派的著名人物有克来孟和奥立振。

非洲的迦太基学派

是在罗马法律概念下的传统,他们反对理性,对教外文化的态度比较封闭。迦太基学派的著名人物,有西彼廉和戴尔都良。

小亚细亚的安提约基雅

这个学派对圣经注解,有另一种传统,他们不重视象征,而注重文字注解。在第四、五世纪的时候,这个学派在基督论上享有盛名,影响了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而曾经传入中国的景教,就是由安提约基雅学派发展出来的。

在这三个学派当中,要介绍两位著名的教父,就是东方的奥立振,和西方的戴尔都良。

奥立振在公元 220 年到 230 年间,完成了一部神学巨著,他是第一部系统神学作品的作者。同时,也开启了系统神学的大门。此外,奥立振也是教会最尖锐的作家,一位卓越的圣经注释专家,他常用象征的方法来注解圣经。他的作品很多,可分为五类,就是圣经考证、圣经注解、辩护作品、神学作品以及实践作品。

至于戴尔都良,他用法律概念和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圣经和信仰。虽然他后来倾向蒙丹派,可是,他可以说是西方神学的创始者。

第四章

第四、五世纪的神学

东方教父

在前面介绍了第二、三世纪的神学思想，这一章，我们要进到第四、五世纪，看看那时候的神学发展。首先，我们介绍一下，第四、五世纪的时代背景，神学背景和概况，然后，再研究东方教父神学思想。

时代背景

自从公元 313 年，米兰诏书颁布之后，教会成为合法的宗教。甚至在公元 380 年以后，教会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于是，教会逐渐和帝国同化，学习帝国的制度、行政、礼仪等等。那时候的教会拥有很多外在的自由，所以在物质、立法和伦理生活方面都有所增进。

神学背景

这样教会不是和政治合一了吗？对教会来说，会不会产生别的问题呢？

不错，虽然教会拥有许多外在的自由，可是因为教会和政治合一，在生活上，却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皇帝即教主义”——因为当时政府、皇帝保护教会，给教会许多

的方便,但是,皇帝却要干预教会的事。这样,教会为了保持自己的超然性,不致沦为帝国的附属组织,就必须奋斗。第二个问题是与文化的接触。教会和希腊、罗马文化接触后,各有利弊。有利的是一些思想、信仰道理,经过哲学的解释后,就更清楚了。坏处是有一些人士想用文化、哲学来改变信仰。所以,教会在思想方面,也必须争取自由,超越哲学范围,因为信仰是从天主来的,不可以随便让哲学思想来改变。

面对教会当时的具体情况和神学背景,当时的教父又被称为古典教父。他们大部分是从事牧灵方面的主教,他们的神学思考,往往是针对时代具体的问题而发的,所以他们的神学非常实际,非常生活化,当然,也有它不足的地方。一般来说,教父们是在某一种异端兴起的时候,才出来反驳,作信仰的见证人,所以,他们的神学范围比较狭窄。当时的异端主要是关于圣三和基督论方面的问题。

当时希腊、罗马文化的修辞学、人文学、自然科学等,纷纷进入教会,而且也影响了教会。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的影响比较小,人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在神学方面,受影响的并不是神学的内容,而是系统和名词的应用。比方说,当时一般学问都包括总纲、神、宇宙和人四部分。于是,教父们也按照这样的系统来讨论神学。

第二、三世纪的教父,很重视圣经注解的工作,这时候的教父也是从事圣经方面的研究工作。虽然这时期的神学,遇到希腊、罗马思想的影响,可是,采用的只是学问系统和一些哲学名词而已。对教父们来说,更重要是圣经的思想。

第四、五世纪的教父,对圣经所作的工作,可分为两方面,首先是文字的分析 and 注解:教父们分析拉丁字、希腊字,然后,再注解圣经。其次是以经解经:以经解经是说,教父们以圣经中的一段经文,来解释另一段经文。而不是像后期的圣经注解工作一样,先研究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学类型,然后说出圣经的启示讯息。

教父们为什么用以经解经的方法,来解释圣经呢?

虽然当时的教父们,无形中受到哲学的影响,可是他们还是和初期教父一样,认为圣经拥有一切真理;教会的信仰也是一样,完全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其他的文化,甚至有人说,希腊、罗马文化也是从梅瑟来的。由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肯定,这时候的教父们,在信仰方面,仍然继续初期教父的神学路线。

东方教父的神学思想

以地区来说,东方教父分布在小亚细亚、希腊、叙利亚等,以希腊语言为主的地区。我们要以五个地点为倒,介绍每一个地区的著名教父。

叙利亚

叙利亚地区的神学比较保守,有名的教父是厄弗冷,他是一位诗人,他经常用诗来表达教会的信仰和思想。

亚历山大里亚

亚历山大里亚地区著名的教父,有圣亚大纳削和济利禄。其中,亚大纳削是东方四大教父之一,他在圣三论方面的神学影响最大。他认为子是父所生的,而不是父所创造的,子属于父的性体,是父的生活的肖像;至于圣神,祂属于子的性体,是从子来的。这样,圣三当中,存在着一种奥妙的性体统一,圣三在同一物体内,表达同一的行动。这种圣三之间的联系,绝对不是受造物之间,道义的联系所能比拟的。圣亚大纳削对圣三的神学作了大量反省,他曾经在公元325年,尼采大公会堂里,驳斥亚略异端。亚略异端因为受希腊“半神”观念的影响,

主张天主圣言是完美的受造物，是天主和世界的中介；而圣神是一个超受造物，附属于圣父。于是亚大纳削便提出了天主圣三是同一性体的观念。

济利禄的主要贡献是在基督论，济利禄反对二位论和一位论，他认为基督是神和人的结合。他的基督论对厄弗所和加采东大公会议，以及东方教会影响相当大。

小亚细亚的安提约基雅

安提约基雅学派和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在神学的重点上不太一样。比方说，在圣经注解方面，安提约基雅学派注重文字分析，亚历山大里亚学派重视的是象征的意义。在基督论方面，安提约基雅学派注重耶稣是真人，也是真天主，至于真人和真天主，怎么样在基督身上合为一个，就很难解释了。而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比较注重基督的整体性，可是，对于耶稣怎么样是真人，也是真天主的解释，一样的发生困难。安提约基雅学派的思想，影响了君士坦丁堡著名的神学家聂斯多略和金口若望。

小亚细亚的卡帕多细亚

这里著名的教父有巴西略，巴西略的弟弟额我略，以及纳西盎的额我略。这三位教父最伟大的贡献是谈论圣神方面的问题。在讨论圣三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触及圣神了，不过，这几位教父特别把圣神提出来讨论；比方说，巴西略在他的圣神论里，他强调子和圣神，应该和父一样受到同等的敬礼，因为子和圣神与父是同一性体的。

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有名的教父是济利禄。济利禄主要的贡献是在圣洗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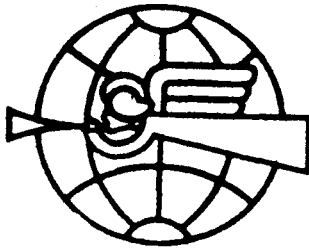
这几位东方教父的神学思想，好像比较注重天主圣三的了解。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东方教父的神学是光荣的神学，凯旋、胜利的神学。因为教父们认为，不论是圣经或教会的信仰，我们都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其他的文化。在神学内容方面，比较接近若望的神学，注重天主子降生成人的神学，这一点和西方教父强调的，天主子来拯救人类的救援神学不一样。这种不同只是强调角度的不同。比方说，西方教父强调救援神学，就是比较注重耶稣的苦难，人的罪恶等等；在神修方面，也就比较重视苦修。而东方教父更注意耶稣光荣地进入世界，世界因着天主子的降生，而被神化了。而且，一切人因为基督的来临，而进入了天主圣三内。这种降生神学体现在若望福音第一章第1—18节里，若望就是以一种隆重、凯旋、光荣的方式，宣布天主子降生了。

东方神学的优点是，对天主的奥迹有整体的看法，而且比较注意神学对基督徒的灵修，以及生活经验的影响。可是，从消极方面来说，东方神学比较不重视概念和分析，所以，思想相当保守，神学的内容不断重复，而没有太大的发展。这种现象和今天的情形差不多，东方人比较注意生活经验，思想比较保守。而西方人往往重视逻辑和分析，比较理性，思想也比较前进。

东方和西方的确有不同的地方。因此，综合来说，东方教父给人的印象和面貌，往往是这样的——尊重传统，重视圣经和教父，神学十分保守，其次是重视奥迹，礼仪具有神秘性，隐修生活是为了在生活中，接近天主的奥迹，而神学是为了在

认知上,接近天主。最后,为了注意异端,把神学重点放在基督论上,使得神学的视野变得相当狭窄。

东方最后一位教父是达玛斯。他是东方教父的集大成者,思想上受柏拉图主义,以及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影响。他最有名的著作是《知识的泉源》。这本书在十二世纪的时候,被译成拉丁文,传入西方教会,对多玛斯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五章

第四、五世纪的神学

西方教父

在前面介绍了第四、五世纪神学中，东方教父的部分，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西方教父的神学思想。

所谓西方教父，是指那些分布在以拉丁语言为主的地区的教父们，拉丁语地区主要有北非、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现在，我们介绍每个地区著名的教父。

北非

北非著名的教父是圣奥斯定，关于圣奥斯定，下面我们会详细地研究。

意大利

意大利地区著名的教父有圣盎博罗削、圣热罗尼莫、教宗大良和大额我略。这几位教父，在教会史上是相当有名的，在今天教会的弥撒礼仪中，还纪念他们。比方，盎博罗削，他曾经为奥斯定付洗。而且，为了谋求教会在罗马帝国中拥有自己的自由，他贡献了不少力量。此外，盎博罗削的思想，因为受到奥立振的影响，在圣经注解方面，比较注意语言的注解。至于热罗尼莫，他是圣经学的主保，主张研究圣经的时候，要从圣经

原文着手。最后，教宗大額我略，他最大的贡献是维持了教会在意大利半岛上的生存，在作品方面，最著名的是伦理丛书。

高卢

位于欧洲中西部，就是现在的法国，高卢地区著名的神学家是依拉利，他对天主三位一体的道理写有著作。

西班牙

西班牙有名的教父是依西多尔。

东方和西方教父在神学思想方面，各有不同的特色，西方教父大部分是主教，他们的神学思想经常是针对生活问题而发的。譬如，当时，东方教父面对的是圣三道理的问题，而在公元 325 年，尼采大公会议曾经对圣三的信仰作了裁定，反对亚略异端，正式宣布了圣子和圣父是同性同体的。可是，尼采大公会议之后，亚略派并没有消失，形成了半亚略主义，主张子的性体，只是相似父的性体而已。这个问题传入西方教会后，导致后来西方教父，也以圣三为讨论的重点。

圣奥斯定的神学思想

在西方教父当中，圣奥斯定是最有名的，圣奥斯定可以说是西方教父的代表人物。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西方教父的佼佼者——圣奥斯定的神学思想。我们要从圣奥斯定的思想特点、启示概念和神学问题等三方面，来看看奥斯定的成就。

思想特点

圣奥斯定的思想方式，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特点是在“万有的秩序与连贯”上。这句话可以分成三个角度来讲——

从形上学来说：奥斯定以为存有界的万物，都是在上主的次序上，天主是万有，一切万物都跟创造者有关联。因此，对于宇宙万物的秩序，应该是从天主救援的秩序来看，而不是看事物的单独价值。世界上每件事物都跟天主有关系，也都有它自己的地位，而且，宇宙万物之间也有关系。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因为宇宙的价值，是由救恩的秩序来判断的，所以，认识和爱不能分开，真正的认识应该使人产生爱，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好的认识。换句话说，理性的认知必须在爱内连贯才有意义。这种由认识而产生爱，包括我们跟天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从神学方法来说：连万物也包括在这种认识和爱的关系里。圣奥斯定非常重视象征、标记，他认为宇宙间的世物，都是天主的象征和标记。人可以从世物本身看出天主，甚至一切的文化和知识，都引导人走向信仰，认识天主。因此，有人发现奥斯定讲圣事的时候，象征的东西，竟然有数千件之多。

由此可见，奥斯定所说的“万有的次序和连贯”，指的是宇宙万物，人类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一切都归于万有的根源——天主。

启示概念

奥斯定把救恩史分成三个阶段：亚当到梅瑟是第一个阶段；从梅瑟到耶稣降生是第二个阶段；耶稣降生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其中，耶稣的阶段是整个救恩史的中心。同时，他认为启

示有主体、客体的分别。譬如，圣经的启示，他认为启示就是天主在人心中自我流露，是天主自己在人心中，告诉人祂是谁。所以，奥斯定也非常重视真理，在他看来，真理就是人心中的光照、光明，是教会的标记。而天主是第一真理，是真理的根源，如果没有天主，就没有任何真理。

神学问题

西方教父在尼采大公会议以后，开始讨论圣三的问题。奥斯定对于神学上的重要问题，几乎都曾经讨论过，但主要的有五个。

1. 首先是天主圣三的问题：

奥斯定的圣三论，和东方教父不完全一样，东方教父是从救恩史，父、子、圣神三位进到一体，而奥斯定是从一体为出发点，讨论怎么会有三位。

2. 摩尼派的二元论主张：摩尼派的二元论，牵涉到天主创造的问题，摩尼派认为有善、恶二元，善神创造善的世界，恶神创造恶的世界，而奥斯定主张世界是天主的工程。

3. 原罪论和恩宠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人民的道德风气败坏，当时有一个叫白拉奇的人，他提倡人应该努力修德养性，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天主的救恩。白拉奇这一个主张的错误，是他忽略了天主的恩宠。于是，奥斯定便对白拉奇的主张加以辩驳。因为奥斯定自己在归化之前，往往体验到人性的软弱，而认为人是受判决的团体。因此，奥斯定便引用圣保禄的思想，认为是天主的恩宠，引领我们得救，人如果没有天主的恩宠，就没有能力得到救恩。因此，即使是小孩子，如果他没有领洗，也不能升天堂。这样，原罪问题、恩宠和自由的问题便产生了。

4. 教会论问题：在奥斯定时候，非洲有一个叫多那特派，

多那特派主张严格,认为教会是圣洁无罪的,有罪的人不能进入教会,异端者如果皈依教会,必须重新受洗。因此,也引起重新受洗的问题。奥斯定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反驳,他主张教会是旅途中的教会。所以,罪人也能进入,而异教徒的洗礼也是有效的。

5. 历史神学:当时因为野蛮人入侵罗马帝国,许多事物遭到破坏,促使奥斯定对历史神学作了反省,而写成了著名的《天主之城》这本书。

第四、五世纪,野蛮民族入侵欧洲,扰乱了社会秩序,当时从事教父思想和著作保存工作的人,主要是隐修院会士、本笃会士,保存教父遗产最有名的有四位。第一位是西班牙的教父依西多尔,其次是 Cassiodorus,他是政治界有名的人物,曾经协助野蛮君王管理政治,虽然后来失去了政治权势,但是,他用自己的财产,邀请本笃会士保存教父的著作。第三位是 Boethius,他的著作保存了希腊哲学,并且把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介绍给西方。此外,他还提出了“位格”这个字的定义,最后一位是大额我略,在他著名的作品——伦理丛书里,集合了前时代西方教父的思想和著作。

东方和西方教父的神学思想色彩的确不一样。虽然东、西方教会在公元 1054 年,才正式分裂,但是,远在教父时代,东、西方的神学思想,早已有了差异。

东西方神学思想之不同

东、西方神学思想的差异可以从六方面来讲,首先,以整体而言,东方教会重视和谐,注意神学和基督徒的灵修,以及跟生活的配合,而西方教会注重的是概念和分析。

其次,以基督论来讲,东方教会强调的是降生神学,重视基督的降生和光荣,西方教会则强调救援神学,重视基督的救

援,和人是**有罪的**。

第三个不同是教会论,东方教会看重的是**圣神的功能和教会的共融**,而西方教会比较不重视圣神的功能,教会比较制度化。

第四个不同是得救的问题,东方神学注意人的神化,西方神学则注意人从罪恶中脱离出来。

第五个是态度上的不同,东方教会是乐观的,认为在降生的奥迹中,人人走向得救的路;西方教会比较悲观,注意人的原罪和无能。

最后一点是对世界的看法,东方神学认为基督降生,世界神化了,宇宙是和谐的;西方神学却认为因为原罪的关系,世界分裂了。



第六章

从教父到经院神学 即第七、八到十二世纪的神学

在前面介绍了第四、五世纪，东、西方教父的神学。这一章，我们从教父时代，进到经院神学时代。在时间上，东方教父时代是在第八世纪结束的，而西方教父时代，在第七世纪就结束了。教父时代结束后，一直到十二世纪，神学思想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发展史。

中古世纪之初，教会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因此，传授学问的地点，大都在隐修院，所以，那时候的神学又叫经院神学。后来，经院神学慢慢走出隐修院，进入大学。

从教父时代进到经院神学，中间经过好几百年的时间，经院神学有没有受到教父思想的影响呢？

事实上，中古时代的神学确实承受了上一代教父的遗产，也承受了过去的哲学遗产。这个问题我们分两点来讲：第一点是教父遗产和中古神学精神；第二点是哲学遗产和中古神学的进展。

教父遗产和中古神学精神

教父时代在教父遗产方面，及在圣经的应用上，一般人以为自己是圣经的继承人，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保存和注解圣经，很少有什么创见。所以一般来说，教父时代可以说是继承

圣经思想,按照时代需要讲解圣经。到了中古时代,一方面要保存教父的圣经思想,另一方面要按时代的需要注解教父的言论和著作。此时,圣经对他们来说完全足够了。至于圣经的注解方式,中古时代继承奥斯定和大额我略的方式,不重原文和文字的意义,而注意拉丁文和象征意义。

中古时代的神学可以说大多是继承教父思想,在圣经的应用上是这样,在人文科学的应用上也是一样。一般来说,教父时代都轻视世俗之学问,但是,奥斯定对世俗之学问有比较积极的看法。中古时代便继承了奥斯定的看法,把人文科学放在信仰中加以圣化,并认为一切学问都是神学的婢女,结果造成学问缺乏独立价值,不容易发展。大体而论,中古时代的精神,就是继承教父精神,把教父时代的作品保存起来。他们的创造性是表现在对哲学、人文科学和启示的整合上。这个时代的作品是积存教父和他人的作品,后加以注解。

哲学遗产和中古神学的进展

在哲学方面,一般来说,教父并不赞成亚里斯多德主义。可是,在公元第八、十二、十三世纪,亚里斯多德主义曾经三度进入西方,每次都产生不同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要分三个阶段,来看看中古神学的进展。

第八到第十世纪,查理曼的文艺复兴时代

在第八世纪中叶到第九世纪初,有一位叫阿尔琴的人,在神圣罗马帝国大力推行教育,并首创辩证法,引起神学的革新。他创立三科制和四科制,即受教育的人,初期要学习文法、逻辑学和修辞学三科,后期要学数学、几何、音乐和天文四科。虽然这时候的神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可是前面所说的这些学科,是用来解释圣经和信仰。所以,这时候的神学,

可以说是理性在文法及逻辑学影响下的神学，它的主要工作，是在亚里斯多德的十大范畴中，澄清圣经里图像的概念，但仍限于文学的解释。

十一世纪的神学

当然因为理性抬头，因此，神学的主要问题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讨论信仰是不是可以在理性的范畴中表达出来？是不是可以用概念来分析？如果信仰可以用理性加以解释说明，那么何必要信仰呢？假如信仰不可以用理性来解释说明，那么，理性有什么用处呢？此外，讨论最激烈的主题是圣体圣事。这个时期有四位代表性人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看法。

培伦加 培伦加认为理性可以解释信仰，信仰是在理性的解释和分析下接受的。对于圣体圣事，培伦加不承认圣体是耶稣基督真实的临在，他认为圣体圣事只是象征而已，象征只是记号而不是事实本身。所以，基督的体血并没有真的在圣体中。

达弥盎 达弥盎是一位极端保守派的人，他对信仰抱着无条件的态度。所以，他反对任何对信仰的理性探讨，认为这些探讨是大不敬的行为。对于圣经，达弥盎认为圣经是帮助人的灵修生活，而不是要产生人文科学。

朗法兰克 朗法兰克赞成理性可以解释信仰，但必须在教会传承中进行。在圣体圣事方面，他反对培伦加的圣体论。

安瑟莫 安瑟莫是十一世纪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今天，有不少人认为他是经院神学的鼻祖。对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他有一种非常有名的想法，就是“我信，好使我理解”。意思是说，先相信，以后才能了解。神学导论里已提过安瑟莫对信仰的体验。他这样说：“我并不是寻求领悟以后才相信，而是我先相信，为的是以后能够领悟，如果我不从信仰开始，就永远不能领悟。”

此外,安瑟莫用本体论来证明天主的存在。天主是最完美的,最完美的肯定是存在,所以天主是存在的。安瑟莫还有一种重要的思想,就是救援论。由于受到日耳曼法律和精神的影
响,所以安瑟莫主张赔补论。他认为由于人得罪了天主,因此人需要救赎,这种救赎要求相当的赔偿,天主是无限的,要赔偿无限的天主,只能由无限来赔偿,所以需要基督的降生和救赎。

十二世纪的神学

十二世纪的时候,启示方面承袭圣经的思想,神学也只涉及理性和信仰的问题。所以十一、十二世纪神学历史,很难清楚地划分。十一世纪因为受到亚里斯多德哲学概念的影响,重视概念而忽略信仰因素。十三世纪受理则学的影响,用理则学来解释圣经,利用理性分析、批判,而产生理论。

在十二世纪,当时神学的代表人物有四位。

亚培拉 亚培拉的思想很有创造性,他不喜欢隐修的教育,只是积存和注解教父们的著作,他主张用理性来探讨意义。因此,他的思想方法可以称为“理性主义”,不过,不是十六世纪的理性主义。亚培拉用理性分析和批判来解释信仰,如果信仰有问题,也不怕用理性加以解释。在神学方面,他曾经因为圣三的道理,跟保守派的伯尔纳多发生争论。在救援方面,他的理论是“主体救援论”,主张人得救并不是依靠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而是因为我们看到基督好的榜样,然后悔改,起而效法基督,因此而得救。

伯尔纳多 伯尔纳多的思想方法,和教父的相类似,被称为隐修院神学。他认为理性和各种学问不足重视,重要的是朗读圣经。他喜欢用象征性的解释来注解圣经和信仰,注重在生活中体验圣经和教父思想。伯尔纳多的神学是以基督为中心,研究神学的目的,是帮助人祈祷。他个人在祈祷方面,富有神

秘性的经验。

维多派的雨果 他主张信仰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各种学问和理性可以用来解释信仰,这样,理性和信仰有了整合,但在概念上常发生困难。

龙巴。龙巴的神学方法,既不像亚培拉的理性主义,认为除非我们了解,否则不能接受信仰;也不像伯尔纳多,认为理性不足重视。龙巴的著作《格言录》,是运用当时理则学的方法,把教父的文句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结构、有系统的书,而且还成为十二、三世纪的教科书,很多神学家纷纷替《格言录》作注解。

中古时代的著作形式受到奥斯定的影响很大。奥斯定一面注解圣经,一面讨论一些问题,比方说,圣三、自由和恩宠等问题。到了中古时代这种综合性的讨论问题分成两部分,如在圣经注解方面,一种是隐修院的注解,重视象征和生活的体验,另一种是经院派注解,重视文字意义。

在讨论问题方面,十二世纪的时候,产生问答方式的讨论,把圣经资料和教父的作品,作了简单的系统化,把相关的资料放在同一个论题之下,详细地钻研。这种著作形式,后来进一步系统化,便形成了神学大全。

神学问题

中古时代讨论的问题,是把奥斯定所讨论的,加以系统化。中古时代的神学问题,除了奥斯定所讨论的问题外,很少有新的神学问题产生。

在圣事论方面,这是十二世纪最主要,而且最有贡献的问题,这时候肯定了七件圣事,也开始讲论圣事总论。

在基督论方面,这时教会官方的基督论是从上而下的,所以,重视的是天主圣言而忽略了基督的人性。但在神学界,比较注意基督的人性,像伯尔纳多,就是比较重视基督的人性。

至于“神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论，十一世纪的时候，神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科目，当时的学科称为七艺。

当时怎么样的学科才可以称为科学呢？这些学科具有最高的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一连串的命题，符合科学的定义，所以属于科学。可是这个科学的定义，引发了一个中古神学上有名的问题，就是神学是不是科学？神学的最高原则是什么？这个争论一直到十三世纪，才由多玛斯解决，肯定神学是一门科学。不过，十二世纪在理则学的影响下，神学家开始对教会的道理加以分辨，什么是属于信仰的道理？什么是属于论题？又什么只是神学界的意见而已。所以，十二世纪的神学已经慢慢地走上成为一门科学的路。



第七章

经院神学的黄金时代

在前面把第七、八世纪到十二世纪，也就是从教父时代到经院神学，各阶段的神学思想发展作了介绍。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十三世纪的神学。十三世纪，可以说是经院神学的黄金时代。为什么说是经院神学的黄金时代呢？因为那时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第三度进入欧洲，加上大学的兴起，于是经院神学步入了高峰时期。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亚里斯多德的影响，及当时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亚里斯多德传统的多玛斯，另一位是奥斯定传统的文德，最后我们作一个结论。

亚里斯多德的影响

十三世纪，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学、心理学和宇宙学等传入欧洲，面对这些新的哲学思想，神学界产生不同的反应。比方说，奥斯定传统的态度比较消极，具防卫性，有的学派则全盘接受。至于亚里斯多德主义，取其中合乎基督信仰的因素，加以运用，对于不合基督信仰的部分，或者消除不用，或者予以基督化。无论如何，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确实影响了神学的内容，并造成经院神学的高峰。

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对神学产生的主要影响有两点：第一点是神学家用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内容来解释信仰，使人对一些肯定的信仰，一目了然；第二点是亚里斯多德把存有界加以分类。这种哲学系统的影响是使得“神学大全”的分类更清

楚,神学更系统化。此外,在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影响下,理性和信仰,自然和超自然的观念得到澄清,而且,彼此间的领域和活动,都划分得比较清楚。尤其是在多玛斯的著作中,神学和哲学的区分,非常清楚。

多玛斯的神学思想

多玛斯一面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同时,他也是上教父们的神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多玛斯重视传统,但他也是一位革新者,他改良了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创造了有次序而深刻的神学巨著。多玛斯的思想充满创意,强调要用科学方法研究神学,他完全承认理性的权利,但他也坚持理性是为信德服务的。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介绍多玛斯的思想:

多玛斯的启示概念

一般来说,无论圣经作者、教父、或者中古时代以前的神学家都还没有把天主启示,作系统化的分析。一直到多玛斯,他才开始作天主启示的分析工作。对多玛斯来说,所谓的“启示”,原来是指天主的光照,其次是指在人心里产生的现象,接着是指进入人类的历史事件,然后是指来自基督的道理,最后是指不同于理性的认识。

这是一种过程,是由主体进入客体性的过程,意思是说,启示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种个人内心的经验。但是,慢慢地,进到天主的启示中,客观地看,到底天主的启示是什么,这时候,个人内心的经验并不是最重要的。由此可见,多玛斯的启示概念,是逐渐由主体性进入客体性,逐渐重视启示的道理,而不再注意个人内心的经验。

此外,多玛斯认为天主的启示,有宇宙的启示和历史的启示。宇宙的启示是创造中的启示,人的理性能够认识。比方说,

到黄山,看黄山的壮丽,就不得不由心底发出对造物主的赞叹,这种由人的理性认出的启示,就叫做宇宙的启示。历史的启示,是人在信仰中,需要天主的恩宠才能接受的启示。历史启示的对象,主要是超自然的真理。比方说,天主的存在,它虽然能由人的理性加以认识,但是,实际上,因为人类罪恶的阻碍,要发现天主的存在,常是困难重重的。因此有罪的人要正确地了解天主,必须有天主的恩宠,必须有天主在历史中的启示。

对理性和信仰的看法

前面我们提过,十一、十二世纪的时候,一直有理性和信仰的神学问题,这种问题到了多玛斯,才得到比较清楚的澄清。多玛斯指出,理性和信仰是人身上两种不同的认知能力。理性是人本来就有的能力,信仰是超自然的能力,两者的领域不一样,理性的领域是自然,信仰的领域是超自然,两者不应该发生冲突,因为都是来自天主的真理。

信仰和理性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理性的作用并不是发现信仰,而是对信仰加以批判、反省和解释。可是,理性的批判、反省和解释是有界限的,因为信仰是从天主来的,理性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虽然理性本身具有能力,原则上不需要外力,就能肯定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可是,理性也有软弱的地方,所以,信仰可以给理性外在的指导,而不是取消理性能力。这样,人仍然可以以自己的能力,来思考事情。

多玛斯对存有本身看法

多玛斯认为事物的存有是天主创造的,事物本身就具有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在救恩次序中,才有意义和价值。换句话说,宇宙万物是天主创造的,所以有它的次序、意义和价值,

而不是因为基督的救援，才有意义和价值。

多玛斯的神学理论

当时，科学的定义是指具有一个最高的原则，由这个最高的原则，演绎出一连串的真理，而构成的系统。多玛斯认为神学具有最高的原则，而且，他把神学问题一条一条连接起来形成系统，所以，神学是一门科学。

至于神学的功能，多玛斯认为神学有三种功能：第一种是面对外邦人作信仰前导；第二种是在信仰的光照下，解释信仰；第三种功能是把信仰经过演绎而系统化。最后，多玛斯认为神学的目的，是在获得天主的知识。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分别从启示概念、理性与信仰、存有本身和神学理论等四方面，简要地介绍了多玛斯的思想，下面要看的是奥斯定的传统。

奥斯定的传统

奥斯定传统是指承袭圣奥斯定思想的学派，比方说，方济学派，就是属于奥斯定传统。奥斯定、柏拉图传统在知识方面，重感情、重伦理和次序，也重视善的一面，所以，知识和爱，也就是真和善常常是相连的。

培根

奥斯定传统中，有两位著名的思想家，第一位是哲学家培根。培根认为知识应该是可以经验到的，至于那些由推论而得到的抽象知识，在培根看来，那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哲学不能进到神学的领域中。今天人们认为科学是可以实验的，这点上培根实在是这种观念的先声。

文德(又译波那文都拉)

第二位要介绍的是神学家文德。文德是奥斯定传统的代表人物。文德认为哲学的作用是使人的头脑更锐利,思想更清晰,为神学作铺路工作。此外,哲学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明。比方说,圣经中有许多的象征和图像,我们可以用哲学来提供一些例证,来探讨这些象征和图像的意义,但是,哲学不能进到神学里面。在神学上,文德认为神学的目的,是格林多后书第三章第18节所说的——

“我们众人以揭开的脸面,反映主的光荣,渐渐地,光荣上加光荣,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正如主、即神在我们内所完成的。”

文德引用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单独的理性,如果没有天主的光照,就不能认识什么。可是,理性如果在信仰光照下,就是一种智慧了。文德把这种在信仰光照下的智慧,分成三个等级:基本的是信仰;其次,是为了了解信仰;因为对所相信的要加以解释,这需要天主的恩惠和特别的光照;这不是理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智慧是面对面看见天主,这是永远生命中的知识。所以,对文德来说,神学是信仰生活中的一环,是面对真理的认知,最后是为了解。

结 论

如果把多玛斯和文德拿来比较的话我们可以作一个这样的结论——多玛斯和文德是经院神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综合性的作家。多玛斯综合了理性和信仰,写出了神学大纲,被称为“天使圣师”,而文德在信仰透视下,也产生了神学大纲,被称为“炽爱圣师”。两个人分别代表两个传统,多玛斯代表亚里斯多德传统,文德代表的是柏拉图、奥斯定传

统。多玛斯重视事物的本质意义，文德看重的是事物救恩次序上的意义。多玛斯和文德的神学都没有偏差，但是，他们身上却潜伏了危机，多玛斯的神学可能导致理性主义，而文德的神学可能导致信仰主义。

第八章

经院神学的衰微

在前面介绍了经院神学的黄金时代，以及当时代表亚里斯多德传统的多玛斯，和代表奥斯定传统的文德两位大神学家。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经院神学的衰微。

时代背景

第十三世纪的欧洲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无论政治生活或教会生活，都处于颠峰状态，造成了神学的黄金时代。可是，到了十三世纪末叶，原来奉教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这些国家因为共同文化的联系，人和思想都自由地互相交流。现在，每个国家却逐渐意识到彼此的差别，都渴望独立自主，君主也渐渐趋向专制独裁。这种社会思想的转变，造成各国君王想摆脱教宗对他们的监护。例如，号称“美男子斐理伯”的法国国王，跟教宗波尼法爵八世，为了国王和教宗的权柄问题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结果教宗失败，严重损伤了教宗的尊严。

后来，教宗克来孟五世继位，他把教廷迁到法国的阿味农，结果教廷充满了法国的风气，行事也常以法国的利益为重，忽略了整个教会的利益，因此，引起其他国家的主教和政府首长的不满。

虽然七十年后，教宗额我略十一世，在圣人的劝导和要求下，回到罗马，但是教会又发生争论，同时有好几位教宗并立，造成西方大分裂，一直到公元 1417 年，康士坦斯大公会议才

解决了教会分裂的问题。

这些争端对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虽然康士坦斯大公会议,解决了教会分裂的问题,可是,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教宗的权威大受减损。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内产生了许多理论。一方面有人主张民主主义,认为教宗并不是不能错的,教宗的统治权是全体基督信徒托付给他的;另一方面,教会出现了精神派人物,他们重视的是教会生活,而不是一些教会的法律,后来的马丁路德,就是属于精神派的人物。

由中古神学的兴起到黄金时代,神学家都努力以理性来解释信仰。譬如,多玛斯和文德,他们解释信仰的方法虽然不一样,多玛斯重理,文德重情,可是,两者的解释都不失平衡。

但是,后来的神学家对信仰的解释有了偏差,造成经院神学的衰微。加上十三世纪,亚里斯多德主义风行欧洲,很多人对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因此,教宗若望二十一世,便禁止亚里斯多德的思想,造成神学界对理性产生不信任的态度。就因为神学界不信任理性,使得十四、十五世纪,思高主义和唯名主义的盛行。

思高主义(Duns Scotism)

思高是方济各会会士,他拥有“精细圣师”的名号。对思高来说,天主是最具体的,天主是唯一的,没有共同的因素。因为人间的哲学、形上学,讲的是普遍的概念,用各种方法探讨事物的共同点,以便处理人间事物的本质。但天主没有共同的因素,不是普遍概念,所以,人间的哲学、形上学不能解释天主的本质。在思高的思想中,人不能用理性来解释天主,信仰是高高在上的,不能用理性来解释。至于我们所认识的天主,是依靠圣经和启示而来的。由此可见,思高认为理性和信仰是分开的;理性的功能不是为了解释信仰,而是以逻辑来判断信仰的条文,看看条文能不能成立,以及判断各条文之间的合理性

如何。这样，神学只是判断信仰条文的可能性，和信仰的解释没有关系。思高的看法是有点绝对，因为好的神学应该可以用理性进入信仰中，解释信仰的内容。因此，思高的思想虽然不属于唯名主义，却为唯名主义扎下根基，使神学走向衰落的道路。

唯名主义

唯名主义以欧坎为代表人物。他是传统的方济各会会士，他把思高的神学思想，推演得更清楚，而形成了唯名主义。在天主论方面，欧坎特别重视天主的自由，这也是方济各会的传统。重视天主的自由，结果产生“唯意愿主义”，对于信仰对象的一切都以天主的意愿来解释。

人怎么样才知道什么是天主的意愿呢？按照欧坎的看法，天主的意愿有两种，一种是绝对意愿，一种是一般意愿。欧坎特别强调天主的绝对意愿。比方说，犯了大罪的人，死后应该受罚，这是一般的意愿。可是欧坎认为大罪人可以借着天主的绝对意愿，仍然可以升天。因为对欧坎来说，罪人和受罚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只是依靠天主绝对的安排。这种观念造成的后果，便是唯意愿主义。

在唯意愿主义下，事物本身没有什么真理可言，只是根据天主的意愿而定。所以，事物本身没有意义和价值。至于理性，理性也只是看出天主在一般次序的意愿，并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身。所以在欧坎看来，不必用理性探讨事物本身。

在唯名主义的思想下，科学是许多含有概念的条文，内在地、逻辑性地连接在一起，而科学的确定性是来自人的传统和经验。至于神学，神学是把圣经中天主的启示，一条一条加以研究，因为神学不能象科学一样，在传统和经验中，找到它的确定性，只是把启示的条文，逻辑地连接起来，所以，神学不是科学。可是神学比科学高，因为神学是把来自天主启示的条

文,用理性的方法加以研究、分析和批判。

按照欧坎的说法,神学是对天主启示的条文加以研究、分析和批判,这种研究、分析和批判的工作,并不是认识天主本身,也不增加信仰的内容,而只是以人的理性,看出圣经中,天主的启示是具有连系性的,是可以相信的。

在神学导论里说,神学是对天主的认知,这里欧坎认为神学不能认识天主本身。由此可见,唯名主义的偏差在哪里,同时也不难了解,欧坎认为外教人也可以研究神学,理由是什么了。所以,严格而论,唯名主义眼中的神学,和今天的宗教哲学是很类似的。在这样的观点之下,信仰和神学是分开的,神学变成哲学的游戏,只是在概念层次上,作琐碎和精细的分析,而不是认识天主自身的学问。唯名主义的主张和前面的神学家,譬如奥斯定、多玛斯、文德等人的看法有很大的距离。唯名主义的出现,使得经院神学走上没落的道路,造成下面四项后果。

后果

唯信主义的出现

因为唯名主义把神学和信仰分离,神学没有办法进入信仰的领域,理性被看成无用的,只有信仰是可靠的。于是,便产生了唯信主义,主张只有信仰是可靠的。同时,唯信主义也替日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预备了道路。

唯理主义的产生

因唯名主义认为神学是对信仰的条文作精细的批判工作,所以,神学注重的是一些名称、概念、逻辑和分析等精细的工作,而产生了唯理的倾向。

信理神学和神秘神学的区分

因为唯名主义认为神学是以人的理性,看出天主启示的连系性和可信性,所以,神学只是一门普通的学科,与信仰的经验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连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以研究神学,于是造成了神学的俗化。另一方面,由于神学不能满足人的需要,而人渴望在生命中,更深地经验到与天主的接触,于是神秘主义便兴起了。

说唯名主义造成信理神学和神秘神学的区分,意思是说神学研究的内容不只是信理神学,还包括灵修生活和牧灵工作,如果神学少了这些,就不是真的神学了。

实证神学和经验主义的兴起

因为唯名主义不信任理性,可是,神学是需要人的理性去探讨的,于是实证神学便产生了。另一方面,唯名主义主张科学的确定性,可以在传统和经验中找到的,于是科学上也兴起了所谓的经验主义。

第九章

宗教改革与宗教改革氛围下的神学发展

前面讲了经院神学的衰微,现在要看十四、十五世纪,看看宗教改革与宗教氛围下的神学发展。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时代的需要,然后是时代的答复,最后是教会的反应与神学的新趋势。

时代的需要

由于十四、十五世纪,经院神学的衰微,在神学上产生许多新的需要,比方说,精神生活的需要、实证的需要,以及主体性的需要。

精神生活的需要

当时,因为唯名主义的影响,把信仰高举在最上面,而且,认为理性不能进入信仰,也不能解释信仰,而只能在概念层面上,作分析和批判的工作。衰微的经院神学局限在概念的系统分析,而忽略了宗教的直觉和与天主的认识。所以,十五世纪末,神学便停留在哲学的层次上,不再是认识天主的学问,只是一些概念的分析而已。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希望能借着直觉认识天主,希望能找到一种更直接、

更简单的途径接触天主，这条途径不再是哲学性的、思考性的，而是宗教性的、安慰性的。

实证的需要

中古时代的神学，虽然继承圣经和教父，可是因为过分注意文句聚集，而失去了继承思想的精华，所以，产生研究圣经和教父著作的需要，希望从历史和批判的观点来探讨这些著作，来确定这些著作的原文和来源，了解圣经和教父们的思想，这就是实证的需要。

主体性的需要

前面在讲到经院神学的黄金时代的时候，提到多玛斯在启示方面，他很重视天主启示的客体道理，也就是天主启示的内容、启示方式等。这本来没有什么偏差，可是，因为后来人们愈来愈强调启示的客体性的需要，注意人内心的信仰经验，同时，也强调信仰的行动。面对上面所提到的需要，当时产生了新的思想如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

时代的答复

在人文主义方面，人文主义的学者，反对整个中古世纪的神学，包括神学的精神、形式、方法和结论。以神学的方法来说，人文主义的学者认为中古世纪的神学方法，比方：神学大纲是野蛮人的方法，并没有增进人的知识，所以不足以采信。因此，他们认为神学应该只谈论基督，引领人走向基督，为人灵阐释圣经的深奥意义，所以，他们更注重圣经的原文和意义，想用历史和注释圣经的方法，取代中古的辩证法和议论法。

首先,他们寻找圣经的原文,研究圣经作者的时代背景以及对福音有比较整体了解的著作,然后根据福音的意义,把福音传给别人。此外,对于基督宗教的启示,和外教的哲学思想之间,人文主义也作了一个结合,但是,这个结合和中古经院神学不一样。

经院神学的神学家们,对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所抱的态度是:合乎基督信仰的就采用,不合基督信仰者,就舍弃或加以基督化。就在这样的态度下,神学家把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所流露出来的理性真理,带入神学里面,用来解释信仰,使人更清楚自己的信仰。这样,信仰与理性,基督宗教的启示和外教哲学思想之间,便有了整合。

在人文主义的看法里,理性和信仰是分开的、平行的。外教哲学思想似乎不是神学思想的酵母,只是作为神学思想的实际例子,或者作为一种支持而已。所以,人文主义的思想,为理性宗教和今天的不信者预备了道路。

除了人文主义外,面对当时的需要,产生的另一种结果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最著名的人物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把基督信仰集中在救恩的问题上,他认为只在基督内才有救恩。救恩是个人从一切非基督的、法律的世界,转而皈依基督;因此他很重视个人的得救经验,而不重视概念的分析。在救恩的问题上,他强调信心以及信仰的主体意义。在神学方法方面,由于路德受唯名主义的影响,认为理性不能解释信仰,而且,他主张人性堕落和无能。所以,他放弃唯名论和神学的理论部分,希望以一套奠基于圣经,且进入信仰本身,重视个人经验和生命的神学,来取代当时的神学。

马丁路德强调圣经和个人救恩的经验。对他来说,圣经和基督信仰的道理,不是要带给人理性上的知识,而是要带给人天主的救恩的经验,促使人从世界转而皈依基督。所以,为了要把天主救恩的内涵传到普世,他强调圣经原文的注解,以及奥斯定思想的研究,因为他认为奥斯定是唯一的教父。

教会的反应

当时的教会，对于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呢？

教会面对当时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教会召开了特利腾大公会议。大体而论，特利腾大公会议具有反新教的倾向，所以相当注重启示的客体性道理。这和马丁路德强调的个人救恩经验是相对的。具体地说，面对新教“圣经唯一”的想法，大公会议指出除了圣经里的启示外，天主的启示也在教会的传承里面。此外，针对新教主张的“成义只需要依赖信心的说法”，大公会议主张成义不只要依赖信心，还需要信理和伦理。最后，对于新教“反制度”的态度，大公会议表示在信仰和伦理道德上，不得任意相反教会训导权。

特利腾大公会议是不是重申教会的信仰和地位呢？

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神学家是在一种“反宗教改革”的气氛下讨论神学。比方说，神学家苏亚雷的主张，便是反映了当时的官方神学。他认为启示的主体是在个人的生命中，启示的客体是在圣经里，在教会的训导条文上表现出来。

除了教会的反应之外，当时教会神学有两股潮流，就是奥斯定传统和多玛斯传统。宗教改革之前，奥斯定传统的唯名论一直占着优势的地位。宗教改革后，奥斯定传统衰微。多玛斯传统则蓬勃发展，神学家对亚里斯多德思想的应用更为普遍。比方说，在道明会的修会里，多玛斯的“神学大全”，取代了龙巴的“格言录”，因此，出现了许多注解神学大全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阐释圣多玛斯的思想，同时也加入作者本人的意见和方法，为多玛斯思想增添了新血液。所以，当时的神学可以说是承继了圣多玛斯的精神。

此外，当时的神学家对神学问题的辩论，比十三世纪时还要激烈，其中最著名的辩论是，耶稣会和道明会关于恩宠和自

由的争论。

神学的新趋势

特利腾大公会议虽然重申了教会的立场,可是并没有满足时代的需要,因此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者的刺激下,天主教的神学产生了新的趋势。

首先是重视神学的实证部分。因为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者,强调历史和圣经注释学的方法,为了表明教会的信理和信仰的最初根源是一致的,天主教神学也开始注意神学的实证资料。在神学的方法上是这样的:先提出圣经的证明,然后提出传承的证明,最后提出神学理由。

另一个新的趋势是神学分类:十三世纪的时候,神学家把所有的神学内容,综合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了“神学大全”。但是在这个时候,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神学家努力的方向,不再是维持思想的整体性,而是针对某一个主题作专门的研究,于是,神学的整体性瓦解了,产生了神学的分类。

比方说,理论神学和神秘神学的分类,信理神学和伦理神学,理论神学和实证神学的区分,以及护教学的兴起等,这些都是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后,神学的新趋势。

第十章

启蒙时期与理性主义下的 神学思想

经过十四、十五世纪，经院神学衰微后，面对时代的需要，产生了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以及神学的新趋势。现在要进到十八世纪，看看启蒙时期与理性主义下的神学思想。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在人文主义、宗教改革，以及个人主义者的哲学倡导之下，理性主义兴起了。理性主义主张理性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理性可以决定存在。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盛行。启蒙运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摧毁一切建立在传统和权威之上的东西；另一种是把生命和知识完全建立在理性上，理性是万能。

启蒙运动很注意人性的直觉和自主，主张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信仰，而不是由外在权威来控制的，所以，人能自由地表达信仰，也能客观地批判信仰。这种思想产生一种相反超自然的倾向，凡事都想以理性来解释，排除超自然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理性宗教便应运而生了，比方说，法国的伏尔泰、卢梭；英国的自然神学论等，他们想办法把宗教和伦理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主张神和宗教都是人的理智可以了解的，而自然原理是不朽的原理。

面对启蒙运动，天主教的神学有什么新的发展呢？

由于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内训导权的作用很大，理性不能十分自由地批判信仰，所以，天主教神学的内容，

所受的影响并不大，主要的影响是在著作的形式上。

信理神学纲要的出现

由于理性主义要求思想明确、清晰，所以，神学家也对信仰作清晰而明确的表达。他们不再使用中古时代问答方式，来讨论信仰。方法包括下列步骤，第一步是设定论题，第二步是问题的叙述，第三步是权威的实证证明，权威包括圣经、传承和教会文件，第四步是神学理由的证明，第五步是问题答复，第六步是推论，最后是有关基督徒生活的推论。这种方法的运用，便形成了信理神学的纲要。

神学新趋势

宗教改革后，神学的新趋势是神学分类的产生。在启蒙时期，神学著作的形式之一，就是百科全书的出现。因为到了十八世纪，神学的分类愈来愈多，神学著作便出现了百科全书的形式，把各种各类的神学都列入里面。

除了信理神学纲要和百科全书的出现外，当时神学著作的另一种方式是，建立系统的倾向。当时哲学所呈现的是一片纷乱，可是数学的原理十分确定。所以，理性主义者认为，如果要使哲学得到像科学一样的确定性，就必须使用数学方法来探讨哲学。神学家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也尝试建立自己的系统，把神学用数学的方式表达出来。

基督新教神学

在新教，也就是辩论基督教方面，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该教的神学家虽然很注意个人救恩的经验，可是，还是在经院神学的方式下讨论问题。到了十八世纪，由于启蒙运动的影

响，神学发生了转变，有些神学家希望排除一切超自然的因素，用理性来解释基督信仰。从那时候起，圣经批判不但兴起，而且到达了顶峰。

在这里，我们以雷辛的思想做例子，来说明当时基督新教的神学思想。雷辛认为宗教必须具备宗教真理，而宗教真理必须是整个人类普遍可以接受的。由于历史事件不是普遍性的，所以，宗教真理不能靠历史事件来肯定。比方说，梅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启示的历史事件，但不是普遍的。宗教真理必须用理性分析，然后才肯定的。至于天主的启示，它的作用并不是告诉人特殊的事，而是教育人类用理性一步一步地认识宗教真理，所以，最理想的宗教，是合乎理性的因素多，理性不能解释的因素愈少愈好。

浪漫主义时代的神学思想

这里说的浪漫主义，是指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大革命之后，继启蒙运动而兴起的，补启蒙运动的不足。浪漫主义是欧洲文艺思想的主流，特征是主观，崇尚理想和美、好奇、富革命精神。

浪漫主义对神学的影响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整合，一个是注重个别性。所谓的整合，是因为理性宗教忽略情感，所以浪漫主义主张理性和情感，自然和人性，次序和自由，过去的文化和现在的文化，应该协调、整合。

而所谓的注重个别性，是因为理性宗教注重普遍性，所以，浪漫主义主张人类都有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个别的经验经过分享，使别人接受，而产生团体性。

薛利马赫的论点

当时，基督新教神学家的代表人物是薛利马赫。薛利马赫

受到十八世纪,康德思想的影响非常深,他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感觉的经验”上。他认为在人的身上,有一种最深的接触点,也就是所谓的直觉。这是一种感受,在一切人世的变幻中,直觉让人体认到,他一定要依附于一个永远不变的无限,这种绝对的依附感是在人的存在中,天主观念的发源地。有时候,在某些人的生命中,这种完全而绝对隶属于天主的原始感觉,是那么活泼而鲜明地呈现出来,他不但自身体验到天主,而且向别人宣告他的经验,这就是所谓的启示。

薛利马赫的意思是不是说,每个人的直觉,是一种叫人体验天主的能力,而有些人特别强呢?

不错,有些人绝对属于天主的感觉特别强,他们把得到的启示宣告出来,因而产生了各种宗教,而这些人物常是宗教的创始者。在这些启示性的人物当中,耶稣基督有祂的特殊性。耶稣基督的特殊性是在于祂对天主的体认是如此的深而完全,所以祂自称为天主子,祂不必任何媒介,就能和天主结合为一。因此,基督宗教的特色,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独特性上,而所谓的基督徒是那些接纳并分享基督启示的人所形成的团体。

由于他强调启示最主要的目的,是对天主的一种领悟,而不是信理或信条。所谓的神学,也只不过是人对天主的领悟和意识,加以详解和表达而已。这种学说在当时,好像受了当头棒一般,惊醒了沉溺在理性气氛中的学者。所以,我们可以说,薛利马赫的贡献是提醒了在启示中属于人心的因素,也就是天主的启示在人内心的经验,以及接纳启示时的情况。当然,这样难免会忽略了启示客体性的一面。

基督新教自由派的兴起

在薛利马赫之后,基督新教自由派兴起,他们愿意面对时代的背景作一种适应。基督新教自由派最大的特色是——在

理性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剔除任何超越的因素，而且强调主体性的关系。对于耶稣基督，他们只着重耶稣在伦理道德上的教训，强调耶稣是伦理道德上的最高标准，剔除一切耶稣的奇迹和超越的一面。因此，基督徒和基督的关系是在伦理道德的实践上。基于这种观点，自由派学者所作的努力是福音的还原工作。就是把包围在福音核心的层层传统教导和文化色彩除掉，显示出耶稣所宣布的纯朴信息。于是，圣经批判的风气达到高峰。

这种只强调耶稣的伦理道德教训，的确有所偏差。自由派神学的产生，可以说是受到当时文化思潮的冲击。当时是一个人本主义泛滥，理性主义抬头的时期，科技的发展使人肯定人本身的能力和 value。可是，在寻求自立和自我肯定的过程中，这时候是在一个刚刚迈步的时期。所以，在神哲学上反映出一种生涩和分歧的现象，把神和人，本性和超性，存在和伦理断然分割，而没有想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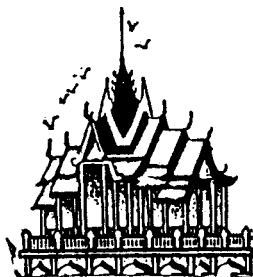
天主教神学

在浪漫主义等思潮的刺激下，天主教神学开始复苏，革新的地点是在德国的都平根。都平根学派把超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予以整合。换句话说，把神和人超性和本性等都加以整合，同时，他们也重视历史和实证的幅度。

这时候天主教神学的特色，我们以纽曼、谢奔和莫勒的思想做例子，说明一下。莫勒把多玛斯以后逐渐信理化的启示，注入新的精神，他强调启示并不是一个超时间的静态真理，而是天主藉祂在人类历史中的行动，所表达的一种动态的自我给予，天主自我给予的高峰就是天主子降生的奥迹。至于纽曼，纽曼提出了信理演变的思想，他肯定信条和权威在启示问题上有它的地位和特色，并强调启示的奥迹性。纽曼的意思是说，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没有人能完全地使启示系统化，

所以到现在启示仍然是一个奥迹。最后,谢奔把实证神学和多玛斯神学融合运用,并强调教会的信理奥迹的一面,同时,他认为启示固然在天主子身上发生的,但人必须在圣神的光照下,才能接受启示,而圣神的光照,就是启示。

最后,我们可以说,都平根学派的革新,虽然对教会思想有所影响,可是并没有马上形成改变。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也没有接受他们的思想,由此造成了现代主义的危机。



第十一章

现代主义的危机与神学新气象

在前面把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神学思想，以及理性主义下，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学作了介绍。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现代主义的危机和神学的新气象。

十九世纪，教会正处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等思潮的激荡中，对于神学问题形成各种的思考方式。比方说，上一章提过的“都平根”学派，他们设法把神和人、信仰和理性作一个协调和整合。当时，也有无神论、泛神论和自然神论，他们反对启示的可能性；还有反对启示超自然的理性主义和半理性主义；以及否定人的理性可以接纳启示的不可知论和信仰主义。这些神学问题的各种学派，都是在当时思潮的冲击下产生的。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

当教会面对这许多论调的时候，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就在这些思潮中应运而生。这次大公会议基本上，并没有看出文化思潮对信仰的要求和挑战，只看出这些思想和信仰抵触、相反信仰的地方。所以说，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对文化界的思想抱着一种“反”的态度。

大公会议有两部宪章，一部是《永远牧者》，强调的是教宗的首席权，另一部是《天主子》，讨论信仰和启示的问题。大公会议“反”的对象，主要是半理性主义和信仰主义。面对半理

性主义否定的启示的超自然性，大公会议一面肯定天主的启示是一个奥迹；一面说明人的理性对天主的奥迹，只能达到某种程度的了解。面对信仰主义所说的人的理性不可能接受天主的启示”这一点，大公会议一面承认启示固然是来自天主，有它的超越性，可是教会有责任保全这信仰的宝藏。同时，也说明人的理性，也有能力辨认天主的存在，因为启示也有可以辨认的标记，比方先知和奇迹就是一种记号，而人的理性能够认识先知性和奇迹性的行为，来辨认启示的真假。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处于理性主义的背景中，反对理性主义，却又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而对于信仰的表达偏重于理智的说明；把启示看成条文式的真理，而忽略了启示是天主的自我显露。此外，大公会议对无神论和基督新教派所强调的内心的启示，并没有提出积极的答复；对于时代的要求，也没有作适应的改革；因此造成了现代主义的危机。

现代主义的危机

现代主义是十九、二十世纪之间，教会受到基督教各种神学的刺激所兴起的一派神学；其主要的目的是想面对当时的各种思潮，作一个适应的工作。在当时的思想背景里，理性主义的影响如日中天，比较宗教学又开始纵横其间；此外，人文科学的进展，考古学的发达，促进了历史批判的运用；因此，福音历史性的问题，也成为热门的问题。

影响现代主义的思想有两种，一种是不可知论。在思想上，现代主义接纳宗教的不可知论，认为宗教真理只有靠感觉和宗教经验得到的，理性对宗教真理是无能为力的。在方法上，现代主义彻底运用当时流行的历史批判法，来鉴定福音的权威性；因此，他们宣称历史中的耶稣的超越因素，事实上是少之又少，多该大刀阔斧地剔除。

其次，对启示的问题，现代主义学者普遍受到薛利马赫的

影响,把启示的概念完全主体化;同时,也把薛利马赫的主观主义推广和发挥到团体的层面。现代主义者认为,人都有所谓的宗教情愫,或叫宗教感,当这种宗教情愫出现在意识中,就是启示。当人在意识中,经验到了这种宗教情绪和感觉,就是所谓的信仰。而基督的启示是基督把人心灵中原来就有的宗教感,出现在祂的意识和言行里。这样,把启示集中在个人身上的说法就是启示的主体化。

教会团体借着对基督的信仰,在基督的言行中,经验到天主,因为这种经验会日益深入,所以,启示会随着教会体验的深度而有所增进。为这个缘故,现代主义者相当重视团体的礼仪生活,因为礼仪生活是团体性宗教经验的场合。至于信理和信条,现代主义学者都把它看成是当时教会表达宗教意识所运用的一些应变的概念,本身并没有价值。总之,现代主义把启示看作人内心的经验,这样,一面肯定了启示内在的幅度,另一方面却失落了启示的客体和超越的一面。

教会的教导

教会训导当局针对现代主义,发表了三篇文件:第一篇是1907年的《可悲伤》法令;第二是1907年,教宗庇护十世颁布的《应牧放主羊》通谕,最后是1910年,教宗颁布的自动诏书中,反对现代主义的誓词。这些文件中,对现代主义从积极和消极两面加以批判。消极方面,首先,反对启示是人意识的流露的说法。因为启示来自天主超越的一面,其次,教会反对启示是不断演进和增加的学说,因为启示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完全完成了。此外,教会也反对信理的真理只是时代性的说法,因为信理的内容是超越各时代的。最后,教会反对启示的内容是在于人的经验和感觉的说法,因为启示的内容是真理,是人的理性能肯定的。

积极方面,教宗的通谕肯定天主的启示,有它外在因素,

而不只是个人自己的经验而已。因为启示是天主亲自进入人类历史的行动。因此启示不只是一种经验，也是理智能够了解和肯定的真理。同时，天主也能利用一些可以看得见的标记，来证明天主的启示，比方说先知的话，或耶稣的奇迹，这一切是人的理性所能认知的。最后，教宗强调启示并不是人意识创造出来的，而是渊源于耶稣，并保存在教会团体的宗徒传承里。从此以后，现代主义的狂澜才遏止了。

神学的新气象

教宗良十三世，他相当注意时代的问题，加上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没有积极地答复时代的需要；所以，教宗良十三世，开始面对时代问题，设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他颁布了一道通谕，这道通谕是《永远之父》。通谕中提出复兴经院神学和多玛斯主义的想法；然后，推动新经院主义、新多玛斯主义的进行。这些新的主义不只是复兴理论神学，同时也对经院神学和多玛斯神学作历史性的研究。这项运动中，Mercier 对神学的复兴贡献很大，他使新的经院神学和当代的科学、哲学，有了交谈的可能。

此外，表示良十三世颁布了一道《新事》通谕，在《新事》通谕中，教宗表达了他对社会和劳工问题的关注。还有教宗面对当时风行的圣经批判，颁布了《上智天主》的通谕，特别提出研究圣经的界限和指南。最后，教宗良十三世，还开放梵蒂冈的档案，协助历史研究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教宗良十三世，的确是伟大的教宗，教会在他的推动下，开始对宗教科学、圣经批判、哲学文化、实证需要、社会问题有所调适，神学也有了新的局面。

当时，神学界有一种争论，尤其是在启示和批判、启示和信理问题上，争论得很热烈，一直到柏龙岱，争论才有了综合性的说法。神学家柏龙岱用一种“内在方法”，来说明启示的

可信性。所谓的“内在方法”，就是以人的行为作为出发点，他主张人的行动是积极的，是精神生活的泉源和内容。而且，人的行动都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意愿，也就是渴望一个更善更美的境界。因为每个人的行动，都是指向一个具体的目标，所以，人的每一个具体的行为事实上是在一个“更”超越的境界。

由上面的解释，可以看到有限的人常常在追求无限。这时候，除非无限的天主向人启示自己，否则，人永远不能满足这种对无限的追求。可见柏龙岱的“内在方法”，不但保存了启示的外在因素和超越性，同时也显示出，启示和人性有密切的关系。这样，柏龙岱终于为启示问题找到了一条中庸之道。此外，在信条和教会传承方面，柏权岱认为传承是教会团体性的生命，教会本身在各时代里，由于救恩的经验，更深地认识基督的启示，所以常有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所以，信条不只是信仰的宝藏，教会代代相传和保存而已。

柏龙岱对后代神学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认为整个人类生命和历史的动向，都是在充满天主恩宠中进行的，这种思想成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件的中心主题，使得教会圣统的论点，向前迈了一大步。



第十二章

二十世纪神学的新趋势

在前面讲了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现代主义的危机，以及危机之后神学的新气象。现在，我们要进到二十世纪，看看当时神学的新趋势。

神学的新趋势

现代主义之后，教会思想在庇护十一世、庇护十二世两位教宗的领导，以及教会某些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地蜕变而更新。在时代的需要中，说出福音喜讯的内涵。形成这种演进的有四个因素；它们是：当代哲学思潮、圣经研究、大公主义以及牧民的需求。

当代哲学思潮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们经历了生命中残酷的一面，再加上工业社会、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等等因素的刺激，人类对生命的存在有了觉醒。于是哲学系统，也由单元的亚里斯多德思想急转成多元的、百家齐鸣的现象。譬如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哲学、动态哲学等，这种种丰盈的思想也能脱离亚里斯多德的思想结构，于是，神学家们尝试从各方面，去阐述天主的启示，显示启示丰富的内涵。

圣经研究

教会的发展在基督教圣经研究发展的刺激下，公元 1943 年，教宗庇护十二世颁布了一道《圣神启迪》的通谕，通谕中鼓励学者应用一切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圣经。从此，开启了天主教会研究圣经的新纪元，圣经学的研究也逐渐脱离信理的束缚，一日千里。这样，不但建立了圣经学术性的研究，也澄清了圣经和信理的关系，同时，也奠定了神学思考的稳固基础。

大公主义

二十世纪大公主义的产生，是因为那时候的教会和基督新教的关系日渐改善，由绝然对立的态度，逐渐地能够互相交谈。教会中的神学家，也渐渐地吸取基督教的思想形态，在融合更新、彼此截长补短中，相互影响。

牧灵的需求

教会从事牧灵工作的人，在具体的工作中，体认到书里的思想方式，没有办法满足世界的要求，不能说出福音喜讯的内容，所以，产生一种更新的渴望。

上面说的当代哲学思潮、圣经研究、大公主义和牧灵工作的需求等四个因素，事实上，并没有先后的分别，是互相交错、彼此影响的。在这四个因素的刺激中，神学家觉悟到神学应该是宗教性的、历史性的、具体和人的生命发生关系的。在这些醒悟中，新的思想形态逐渐形成，革新了教会十几世纪来，因循的神学体系。在说明革新神学的观点之前，我们先介绍基督新教的神学，然后介绍新思想形态形成过程中，教会内发生的“新神学事件”。

基督新教神学

在基督新教的神学中,我们要介绍三个学派的思想:

比较宗教学派

比较宗教学派主要是研究各种宗教的来源。因为他们只着眼于历史现象的研究,所以认为基督宗教只不过是现存的各种不同宗教和哲学的混合体,一点都没有特殊的地方。此外,他们还主张基本上,世界上凡是影响人生命的宗教,都含有超自然的启示,因此,耶稣的特殊性是针对基督信徒来说的,他对一般人来说,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了。

新正统派

新正统派不但是当代基督新教神学的主流,也为基督新教神学开启了新的纪元。为了避免重蹈前人的复辙,新正统派虽然也用历史方法,可是基本上,还是走正统神学的路,强调启示的超越性和特殊性。这一派著名的大师有巴特、布鲁内和布特曼。

巴特 他用辩证法来表达启示无法用人间言语完全说清楚的奥蕴内涵,形成著名的辩证神学。为了弥补理性主义,反对启示超自然的错误,巴特强调,启示并不是永恒抽象的真理,而是超越的天主,进到人的生命中。此外,为弥补感觉主义的主观理论,巴特强调天主是绝对的“另一位”,启示是天主在基督身上,进入人间的具体事实,所以,启示并不是主观的感觉。还有,针对历史主义把启示完全相对化,把启示看成一般的历史态度,巴特提出了启示的绝对性。可是,巴特强调人的理性绝对没有认识天主的可能,这是巴特思想最大的偏差。

布鲁内 布鲁内特别提出天主启示的超越和独特性,来

弥补过度强调伦理性的说法。同时，布鲁内指出，天主的启示是充满活力的，是天主跟人之间位际关系的来往。这样布鲁内的思想打破了天主教把启示当作宝藏的僵化现象。在启示上，巴特和布鲁内的贡献就是复兴了天主启示的神性超越性，以及人应该对信仰投身的要求。

布特曼 首先布特曼承认新约中神话的存在，所以他开了福音形式批判的先河。其次，在神学方法上，他澄清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神学，在科学方法运用上的差别，最后，布特曼说明启示和人生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救恩史学派

在巴特、布特曼等新正统派学者强调启示中天主绝对超越的一面时，免不了忽略了天主启示历史性的一面；加上二十世纪的时候，圣经的研究受到现代科学的影响，相当注意历史方法的运用，所以也促使学者们注意到启示和历史相融合的一面，而形成了所谓的救恩史学派。救恩史学派的学者，以圣经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从圣经的记载中，看出天主的启示是在历史中进行的，而且，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整个人类的历史文化，就是启示开始的舞台。这一派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库尔曼，库尔曼提出一个叫做“在历史中的作用”，当作神学思考的出发点，因此有人称他的神学体系为“作用神学”。

天主教神学的革新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天主教神学的革新，也就是神学俗化的倾向。产生俗化倾向的原因，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基督新教神学的刺激下，天主教神学和时代文化交流的倾向愈来愈明显。所以，所谓的俗化倾向，指的是和时代的文化交流，适应

时代的新趋势。

1939年起,法国便发生了新神学事件。当时有些神学家,像 de Lubac、德日进等,他们愿意面对时代的需要,使神学有“新”的面貌出现。这些神学家认为信仰和信理不完全一样,信理是在各个时代里,用当代的语言来表达信仰,信理是演变的。所以,他们主张神学要回到教会信仰的泉源中,找到根源,同时,也要走向时代、适应时代和时代发生共鸣。

革新神学家体认到,澄清信仰和信理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大前提。神学必须注意到信仰的整体性和牧灵的幅度。如果神学因为宣讲方法不恰当,不能被当代人所接受,那么,耶稣的福音也没有办法深入人心,改变人的生活。所以,神学不但应该注意信理上的分析,也应该注意牧灵的要求。至于信理,信理是教会对信仰的表达,虽然天主在基督身上的启示,已经完全彰显出来;但是,由于教会在各种时间和空间,以及不同的文化中,在圣神内,不断地更深更广地了解启示的内容;然后,用当代人的语言,去了解和说明启示的内容;使得基督的启示能够被各时代、各文化的人所认识。所以说,信理是演变的,同时,这种演变形成了信理的发展。

对于新神学,教会当局担心会是现代主义再次出现,所以,教宗庇护十二,在1950年颁布一道《人类》的通谕,来阻止新神学的发展。于是,新神学事件就此结束。这个神学复兴虽然受到一时的控制,可是,它对教会思想的进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新神学除了注意配合时代的需要外,在启示方面,和前面的几位基督新教神学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革新神学家认为,启示是天主以祂在历史中的行动,来向每个人或每个民族,逐渐自我显示的事实,这个事实是历史性的、宗教性的、存在性的,是言语,同时也是行动。所以,启示是一个整体的事实。启示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开始,在基督的死亡、复活中完成,今天再没有启示发展的现象。综合来说,由于革新神学和

世界及文化思潮的交谈,使得神学开始注意历史的幅度,以人为中心,重视位际关系,并且在各神学科目中,寻求整体的观念,而形成今天神学的特征。

第十三章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与未来

在前面介绍了二十世纪教会神学的新趋势，就是注意历史的幅度，以人为中心，以及重视位际关系等新的趋势。这一章，要介绍的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及大公会议之后的神学进展。

教会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背景

前面一章所谈的圣经研究的发展，大公主义的进行，吸取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圣经研究，礼仪运动的推行，牧灵的需求以及与当代思潮的交谈等，可以说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时代背景。

精神与目标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精神，可以说是“使教会成为世界性的教会”。它的目标有三个：第一个目标是保持并促进天主教的信仰，且用更有效的方法，把信仰传到世界各角落。第二个目标是推行基督徒的合一和基督徒生活的革新。第三个目标是发扬教会的活力，以及教会对当今世界的贡献。整体来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观念是经过时代的洗礼，而呈现的一片新气象，除了表现出教会平易近人和宣讲的特色外，还洋溢着返本还源的圣经色彩，以及充满祥瑞之气的大气

息。

这些特色可以由大公会议各项文献的内容，以及大公会议对“启示”和“教会”的概念的表达上，看出端倪。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各项文献的内容——比方说《礼仪宪章》，宪章里明文规定，礼仪中可以使用本国的语言，这样，让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可以深入当地独特的文化里面。

再如《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宪章中把教会看成一个行动的整体，这个整体教会应该意识到自己对人文历史的开创，负有责任。

还有《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个宣言是教会第一次给各个世界性的大宗教，一种积极的评价。教会承认这些大宗教也有真理，在《教会宪章》、《传教法令》和《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等文献里，都宣称天主普遍且有效的救援意愿，已经在每个人心里了，除非人在良心上做了邪恶的抉择，他已经拥有天主的救援。由这个事实，可以看出纯正的救援性启示信仰，有可能不必用基督宗教习惯用的话说出来，因为天主的救援已经在每个人身上了。

此外，文献有一篇《信仰自由宣言》，这篇宣言积极提倡并鼓励任何形式的大公运动，早日促成基督宗教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特色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特色之一，就是对启示的概念的表达。大公会议对启示的主要概念是——天主因着祂自己的仁慈和智慧，把祂自己、祂对人的计划，以及祂和人的关系，用言语和行动显示给人，使人能够藉着基督，在圣神内接近天主父，成为有分于天主性体的人。由这种启示的概念可以看出，大公会议已经跳出了把启示看成“道理”的旧窠臼，而回

到圣经中,以天主为中心,从历史的角度作存在性和位际关系的描写。

神学进展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神学也提出一些指南——

1. 神学必须推动圣经研究,而且要互相合作,因为圣经研究是全部神学的灵魂。

2. 神学必须推行历史性的研究。这一点在《司铎培养法令》第16节上,这样说——

“在讲授教义神学时,首先应提出圣经论证,之后,应给修生讲明东西教会的教父们,对每一条启示真理的忠实传授和解释上所有的贡献,以及每一条教义对整个教会史所有的贡献。”

3. 神学的整体性。教义神学必须透视各项奥迹彼此间的关系,其他的神学课题都应该借着与基督奥迹和救恩史更生动的接触,予以革新。

4. 神学必须能回答关于天主、基督、人以及未来等基本的问题。

5. 神学必须推动交谈,交谈的对象包括文化思想,其他基督信仰团体,以及其他宗教。

6. 神学还必须强调牧灵的幅度。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大公会议的开幕致辞中清楚地阐明,我们的信仰只有一个,而神学是用不同时代的语言思维来表达我们的信仰。再加上大公会议精神的推动,于是神学活动便热烈地展开了。下面,我们分别以神学主题、神学特点、神学的新趋向三点来加以说明——

神学主题

以单独性的问题来说,当代最热门的主题,有福音的历史性、圣体圣事、忏悔圣事、原罪等四个神学主题。以神学的观点来说,从大公会议以后,可以分成三个主要时代,就是教会学时代、基督学时代和圣神学时代。因为大公会议期间,以及结束后好多年,教会问题层出不穷,可以称为教会学时代。之后,教会追溯源流,回到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说是基督学的时代。近年来,圣神学的声音也逐渐响起。以当代教会生活的复兴来说,圣经和礼仪,是普遍受到重视的神学主题。

神学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重视历史的幅度——今天的神学并不是忽视奥迹的本身,可是,特别注意天主的计划在历史中的实现;所以,在神学的各科目中都有意识地、有方法地引进历史的幅度,造成神学的革新。正如在神学导论最后几章,讲当代神学的轴心课题的时候,曾经提过。这是当代神学的特点之一。

第二特点也是我们提过的——以人为中心,着重位格和际关系。在当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今天的神学关心各种奥迹,也关心奥迹和人得救的关系,同时,也强调天人之间的位际性来往。

第三个特点是把握事实的整体观。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神学是在不断区分、朝各个方向伸张,造成分裂现象的状况中。今天神学关心的是整理、整合、统一,给予整体的面貌。神学走向整体观,使我们尖锐地意识到,每种科学之间合作的必要,各种神学科目,不再独立作业,而是互相关联的,对领悟天主的奥迹来说,各科都有它不同的贡献。

第四个特点是交谈的精神。这种交谈不只是言论上的交换意见,还包括对别人开放的态度,互相给予和接受。交谈的基础是深深地尊重别人,和抱着随时愿意为真理而放弃己见的态度。交谈的对象首先是在神学家们之间,然后是与其它基督信仰团体、世界各大宗教、近代的无神人文主义,以及今日的哲学等。借着这样的交谈,教会更清楚自己信仰的奥迹,同时,也使得圣言有一个合乎时代的了解。

最后一个特点是服务的态度。今天神学,虽然丝毫不放弃严格的学术研究,可是,也保存着牧灵的方针、服务的意愿。神学愿意为教会、圣言、训导权和全体天主子民服务。

神学的新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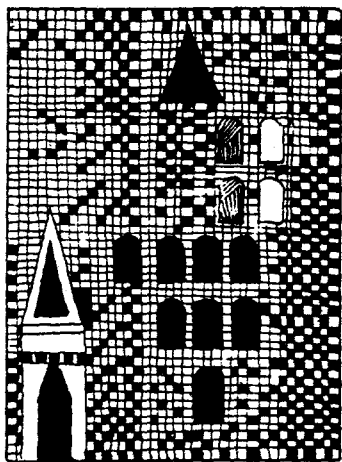
新的趋向可以分两点来讲:第一点是以当代世界问题为己责,第二点是神学走出欧洲大陆,迈进整个世界。神学的新趋向是在大公会议的精神,也就是“使教会成为世界性的教会”——的影响下产生的。以当代世界问题为己任,意思是说,把当代世界的问题,看成是教会的问题,然后提出圣经和信仰上的答复。对于第二点说的,神学走出欧洲大陆,迈进整个世界,这是让基督宗教的固有信息,真真实实地呈现到全世界各角落。所以,各地方教会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设法找出适合的方式来表达信仰。这样,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神学表达方式,比方说,南美洲的解放神学,亚洲、非洲的本地化运动等等都是。

未来的方向

这种“使教会成为世界性教会”的精神,仍然是教会未来的方向吗?

根据近代著名神学家拉内神父的看法,由神学观点来说,

教会历史可分成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犹太式基督宗教时期，然后保禄把犹太式的基督宗教，转化成外邦人的基督宗教；于是教会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建基于希腊欧洲文化上的教会时期；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把教会带入了第三阶段，就是世界性的教会时期。目前，第三阶段刚刚起步，刚刚由欧洲型的基督宗教，逐渐发展成全世界的宗教。因此追本溯源，回到基督信仰的根源。在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找出适合的信仰表达方式，以及在多元的宣讲方式中，保持信仰的统一，可以说是今天神学努力的方向。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内部资料准印证(2000)第018号